

西双版纳文史资料

第十二辑

西双版纳文史资料

第十二辑

目 录

昆明市政协

- 在运佛牙的日子里.....谢盛央(1)
云南天主教发展述略.....何品军(6)
解放前昆明市第一个以宗教音乐为主的合唱团
——西南歌咏团殷波(15)
古幢与佛教叶铸(18)
记昆明居士林艾奇(22)
两部《古兰经》的译者都是云南人马宝忠(29)

昭通地区政协

- 浅谈永善汉族的孝歌颜忠杰(32)
昭通回民抗暴斗争的特点、意义和教训孔令文(37)
昭通民族文化掠影谢崇曜(47)

东川市政协

- 东川市“布依族”族属情况简介贺良栋(52)
东川彝族传统节日及婚丧习俗曹卫华(60)

红河州政协

- 红河州宗教史概略林增琪(69)

红河地区民族史资料史略	蛮 夫(83)
北京、华沙之行	龙介仁(97)

文山州政协

文山州民族文物的瑰宝——铜鼓	李加能(105)
文山壮族苗族民间装饰性美术	王定尧(113)
浅述文山壮族的古代文化	黄树辉(121)
为了壮乡苗岭的丰收	杨毓文(129)
伴歌生活的民族	王明富 黄昌礼(136)
富宁林业民俗	黄开祥(142)

思茅地区政协

孟连末代土司头人的出走与回归	陶 明(147)
糯福基督教堂的来历	张启隆 李 贞(152)

西双版纳州政协

社会变迁中的傣族文化	郑晓云(156)
基诺历及岁首观念的改变	刘 怡(181)
军民同心协力保边疆	张兴智(198)
试论西双版纳民族经济的快速发展	吴庭才(210)
山区经济开发的十年回顾	吴庭才(218)

在运佛牙的日子里

谢盛央

1956年6月上旬,我刚从白鱼口云南省工人疗养院回昆明汽车运输总站,一位同志来叫我马上去书记办公室。一进屋,就看见书记陈馨生和总站长钟林都在等候着,我想一定是有重要事情。书记说:“老谢,你疗养回来了,身体怎么样?”我快人快语说:“身体很好,有任务吗?”陈书记郑重地说:“党委开会讨论从总站挑选一位政治思想好,又有驾驶经验的汽车驾驶员,来担负党交给的重要任务,运送佛牙到我省最边境的地区给各民族朝拜。”钟林总站长接着说:“这是个政治任务,要用生命来保证完成好,不能出半点差错,否则我们总站交不了差。我们考虑你是总站汽车驾驶员中一位先进人物,所以放心把这重大任务交给你。你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运送的佛牙,是释迦牟尼的一颗牙齿,是个无价之宝,在金钱上无法估计。运送几处地点,时间大约4个月左右,这是个光荣而艰苦的政治运输任务。”虽然当时我对佛牙的意义还不了解,但从领导的态度和人员的挑选中,我感到这是一次特殊的运输任务,我能承担这个任务,是很光荣的,但责任也非常重大,我二话没说,接受任务,并决心胜利完成。

去省委统战部报到时,受到陈部长接见,他再次严肃地交代了任务,还亲切地详细询问我:“开了几年汽车?在云南开

车行驶过那些地方？在运输安全上做得怎样？”我都如实作了答复。他对我的回答，还是很满意的。他说“这次任务你是开车运送佛牙到我省最边界的地区，共有4个地点，首先是芒市约一个月，接着到耿马、丽江、景洪，给我省各族人民朝拜，还有国外边民也来朝拜，他们对佛牙很敬仰。”他指出这次任务是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的，总理非常关心云南各地朝拜佛牙的情况，要求代表团每天用电话向他汇报情况。佛牙在云南边疆有助于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和加深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的理解，特别在芒市佛牙供留的时间较长，缅甸前来朝拜佛牙的人较多，是增进中缅两国人民的友谊，为明年周总理与缅甸总理会谈作好准备和打下良好的基础。陈部长的话，使我对运送佛牙的意义，认识更明确了。

6月20日左右，我将汽车开到原卢汉的公馆，将佛牙装上车。佛牙放在用黄金铸成的一座金塔上，塔身高一米八左右，底座是一米见方的正方形，金塔周围镶有几百颗宝石，正面有一朵莲花，是放佛牙的位置，雄伟庄严，金光闪闪。

运送佛牙的代表团，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任团长，有三位佛爷，他们来自四川、湖北，都是高级和尚，加上我们工作人员共有20多人，有汽车3辆，中吉普、客车各一辆，我开的依法车，是专门装佛牙的，中吉普坐有一班武装人员，客车上坐的是代表团人员和新闻记者、摄影员和公安人员。由昆明出发到芒市，途中行驶5天，每到一处住宿地时，装佛牙的车都停在公安部门或军分区，严加保卫。到芒市，在一公里外，就见各族人民敲锣打鼓来迎接佛牙，特别是少数民族，不论男、女、老、幼，都把穿戴在身上的衣服、头巾，围裙等拿来垫在公路上，让装佛牙的车压过，认为佛牙给了他们福

气，能长生不老，感到非常高兴，非常自豪。他们手拿香和纸在公路上叩头，我只好用低档慢慢行驶，把佛牙送到佛庙，给各族人民朝拜。缅甸来朝拜的人比较多，他们都由嘛町过来，芒市运输站组织车辆日夜运送朝拜的人。我也开车参加运送人员。缅甸人听说我的车是运佛牙的，因此特别受到人们的欢迎，他们争先恐后拥过来，专等此车坐。

佛牙在芒市供朝拜有一月之久，在这一个月中佛爷日夜守候在佛牙面前念经；朝拜的人们手拿贡品、线香和钱纸，在佛牙面前磕头，有的整天不停，求佛牙保佑全家平安，长生不老。7月20日左右，我们离开芒市去耿马，在途中我和老佛爷闲谈，问到佛牙在少数民族人们中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威望？为什么佛牙及金塔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没有被窃走？国民党、军阀占领北京时也没有窃走？老佛爷说：“佛牙是释迦牟尼的一颗牙齿，在二千多年前，释迦牟尼出生在印度，他是佛教的创始人，而东南亚一般人民都信佛教，释迦牟尼圆寂后，有四颗牙留下来，中国唐朝时代，其中一颗佛牙很早就流入中国，所以是中国的国宝。但清朝朝廷腐败，英国向中国要这一国宝，当时有一位相爷认为把国宝送给侵略者是一件可耻的事，他千方百计设法仿造一颗假佛牙给英国，把真佛牙埋在地下，写上说明，又在地上造一座宝塔压住。1953年在埋佛牙之地搞建筑才发现这国宝——佛牙。”[注]

我们去耿马途中，正好赶上雨季，由南涧到耿马公路是才修建不久的毛路，车辆行驶非常艰难，特别是双江至耿马，虽然里程不长，但从早晨8点出发到晚11点多钟才到，途中塌方多而路阻，又下大雨，汽车挂上防滑链条。在离耿马还有几公里处，坍塌的土方较大，耿马县政府组织民工抢修，只见灯

光火把照着人山人海。经过几小时紧张劳动,才把公路勉强修通。我开的汽车行到塌方地段,泥土阻车,轮胎打滑,无法过去,右边是险崖,河水急流哗哗的响,汽车已偏向右边。我看很危险,汽车再开,有掉下河的可能,我向团长说明汽车的危险性,建议用人力把车拉过去。团长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车子前面用两根大绳子由一百多人拉,汽车周围用人推,才把汽车拖出塌方地段,安全到达耿马县城。当夜把佛牙安置在佛庙,受到半个月的朝拜。在这半个月里,阴雨绵绵,但是朝拜的人们顶风冒雨,不畏路烂泥滑,由边境山区和国外赶来。

离开耿马县城到丽江,途中一路顺利,把佛牙安置到寺庙,寺庙离丽江城有三公里左右,在一座山中,寺庙周围树林茂盛,寺庙里面日夜灯火通明,来朝拜的人,不论男女老少提着贡品、香、纸求佛牙保佑,经过半个月的朝拜,离丽江返回昆明。

1956年10月7日,由昆明起程,开往景洪。我初次到景洪,当时气候炎热,那里街道不多,住房只是竹楼,还用茅草盖的屋顶,只有当地政府是幢瓦房。把车开到一座寺庙里让人朝拜佛牙。这里风光秀丽,寺庙周围大树参天,每棵树好似一把大伞,人走进寺庙中感到非常凉快。来朝拜的人手拿贡品,日夜不停的在寺庙里向佛牙磕头,佛爷闭目念经。庙外赶街的人十分拥挤,晚上放电影,那场面多么热闹。经一月之后,佛牙才离开景洪返回昆明。到昆已是11月中旬,正是穿棉衣的季节。我把汽车开回原卢汉公馆,将佛牙这个国家最珍贵国宝卸下,放在保管室,准备用飞机运往北京。

我运送佛牙历时将近半年,汽车行驶6千公里左右,安全无损,顺利地完成了这一光荣而艰苦的政治任务。

〔注〕佛牙 相传释迦牟尼圆寂之后,曾留下四颗牙齿,其中之一,很早就传入中国。辽道宗咸雍七年(1071年),曾在北京西山灵光寺建塔供奉。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原塔被毁。后灵光寺僧人整理塔基时,发现贮藏在木匣内的佛牙。1955年中国佛教协会特奉迎安置于北京广济寺舍利阁。1957年又在西山原址附近重建佛牙舍利塔,1964年建成,将佛牙供奉于塔内。(引自《辞海》)

(本文作者谢盛央 曾被评为历届云南省、昆明市特等劳动模范、一等劳动模范,后任昆明、玉溪的汽车运输总站及交通技工学校车队长、科长等职。已退休)。

(昆明市政协文史委供稿)

云南天主教发展述略

何品军

一、根据《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元朝时，马可波罗游云南丽江，途经大理，即在此地发现几位天主教教徒，但他们不可能是云南人。

又根据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教会年鉴》及《教会大事录》里记载，1702年，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雪布郎(LeBlanc)神父被罗马教庭委任为云南(教区)的主教，并且当时(1702)他已从福建赶到云南府(即今昆明市)服职，初到昆明就找到了4个教徒(可能是外省人)。由于他传教有方，教务发展很快，在四年中就发展了一千多教徒。因当时发生“礼义之争”，外国传教士不允许教徒敬拜自己的祖宗，违背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康熙皇帝下令禁止信仰天主教，雪布郎主教被清王朝于1706年驱逐出境，从此云南的天主教消沉了33年。

到了1739年，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马弟利亚(Matiliat)神父又被罗马教庭委任为云南主教。此时正是乾隆年间，(乾隆1736—1796年，在位共60年)。虽马弟利亚被委任为云南主教，但他始终没有来到云南。

1840年，罗马教皇额我略16世，正式把云南教区从四川教区划出，成为独立的云南教区。同时罗马教庭又委任了巴黎外方传教会的袁若瑟(Ponsot)神父为云南教区主教。当时

云南的主教府在今昭通地区盐津县的龙溪村，袁若瑟主教刚到云南时，教徒人数数据统计还不到一千人。

袁若瑟于1881年病死于盐津县龙溪村的主教府内，1881年，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古若望(Fenouil)被罗马教庭委任为云南教区主教，接任袁若瑟主教的职务。〔注：巴黎外方传教会(Mission Etrangere de Paris)它是天主教的一个传教会，由法国人巴吕(Pallu)和郎伯尔(Combert)，1663年在巴黎建立修道院，遂成为该地中心，会员不发修会誓愿，但有会规，过共同生活，终身为传教服务，规定三十五岁以下的神职人员可以参加申请入会，在教工作三年以上，始得为正式会员。1682年来华传教。〕1883年，古若望把主教府从盐津龙溪村迁移到昆明，最初只是在东门外购了一所小房子作为居住之地。1884年，因古若望被云南当局派遣到贵阳迎接劳总督，事后云南当局为了酬谢他，就赠予了他一块土地(今平政街41号——省卫校)，主教府就在此地落成。

二、古若望主教把主教府迁移到昆明后，随之神父也有所增加，同时也办起了教会小学。因办后不久，就到1900年(即庚子年)，值义和团运动兵起，“教案”也随之开始。1900年法国领事从越南运来一批军火寄放于平政街教堂内，引起了人民群众愤恨，遂放火烧毁了教堂，古若望主教逃到越南河内，清政府镇压了义和团后，生怕洋人惹事，遂向云南天主教会赔款20万两银子。教会又重修了教堂。

凭借清政府向教会赔款20万两银子，教会不但重修了教堂、小修院(小修院，天主教会办的专门培养神职人员的最初一级学校，相当于小学)，此外，还有中修院(相当于中学)、大修院(相当于大学)。而且还买了许多田地、房屋。经过此次

“教案”，很多人来信奉了天主教，信教群众也增加了，教会的教务也发展了一大步。

清政府镇压了义和团运动后，同时恢复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事业。古若望主教也从越南河内返回昆明，1907年死于昆明。

同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金梦旦(Detyrestaryou)被罗马教庭委任为云南教区主教。金主教以前，教会参加的社会活动极少。在文化方面，只办了一所教会小学，是为教会内部的需要，培养云南本地区的传教人员。

金梦旦主教接任后，教会参加的社会活动发展很快，特别是社会慈善事业，文化教育方面。

1910年，金梦旦主教请来保禄会在昆明办起了修女院。1921年，办起了一个诊疗所；一个育婴院、收容外教婴孩；一个孤儿院；一所女子手工学校；一所寄宿学校，专招收西洋人和中国富人的子女；一所中国贞女院，培养助理传教人员。

1923年，在圆通街办起了一所女子法文学校，增加中国修女入保禄会，保禄会修女最初由二人增加到八人。并且还吸收了中国贞女院的毕业生进入保禄会当修女。

1928年，创办了一个传教学堂，招收男性教友，培养他们当传教先生。

因云南土地广大，教务发展也比较快，教友也日益增加。据云南天主教传教会统计，至1929年云南天主教已发展教徒一万八千多人。当时整个云南教区共有20个左右堂口，分布于云南各处，但主要分布在大理、宾川、鹤庆等县和昭通地区。

1929年，因巴黎外方传教会人力缺乏，无力统管云南教区，通过罗马教庭批准，产生了大理教区的划分。1930年正

式划分出大理教区，初由叶神父代管大理教区，属于法国佰多郎圣心会(Sacre-baeur de Bethauon)管理，主教住宅设于大理城内。正式成立大理教区后，由徐副主教管理，到1948年才正式祝圣为正权主教。

雍守正(比利时人)，1910年来华初到四川成都教区传教。1924年到北京担任罗马教庭驻华宗座代表刚恒毅的秘书。他因善于交际，办事能力较强，被巴黎外方传教会看中，选拔他来云南担任主教，1933年6月雍守正在法国祝圣为主教。1933年11月22日，雍守正赴云南昆明接任主教之职，管理云南天主教教务。

雍守正主教刚接管云南天主教教务后，就大显身手。因他还没有来云南之前，就了解云南天主教的教务情况，他知道云南教区没有培养神职人员的大修院，过去从小修院毕业的学生都是送到南洋槟榔屿(今马来西亚)大修院进行高一级的培训。但因槟榔屿地处赤道，天气十分炎热，云南学生不习惯。因此，1933年6月雍守正在巴黎外方传教会总修院领了主教品之后，马上就同圣苏尔比斯会总会长越迪业(Uerdier)订立了合同，派遣会士到昆明创办大修院，培养当地的传教接班人。1935年，昆明大修院成立。12月9日正式开学上课。圣苏尔比斯会派来会士二人，洪文颢(Grignon)当院长，杜焕文(Stutz)任教授。除招收本教区的学生外，也招收了四川、贵州、广西、湖南的学生，这样，昆明大修总院实际上已经是一个西南教区的联合总修院了。

雍守正鉴于当时昆明市区向东南郊外发展，所以决定把主教住宅让出来办大修院，又在南郊附近滇越火车站太和街重新修建主教住宅和教堂。他向国外到处捐款，仅仅八个月

的时间,主教住宅就已建成(昆明市北京路93号主教府),雍守正1935年9月搬到太和街主教府。

1934年7月29日,雍守正主教在昆明和澳门慈幼会会长普拉加(Braga)签订合同创办上智男校(中学)(即今昆明六中),1935年又托圣保禄会修女创办了上智女校(即今昆明圆通街五华小学),1935年10月10日在昆明市教育局正式立案,上智男校1936年9月开学,并且还附设上智女校。

雍守正主教任职后,初次巡视教务感到昆明教区太大,不好管理。因此,想把滇东北划分出去,另外成立一个教区,而且立即把这个计划呈罗马教庭。罗马教庭正式批准了成立新教区计划,并命名为“昭通监牧区”,又委任了陈达明(四川宁远府教区的中国神父)为新教区的主教,同年10月21日,陈达明到了昆明,按照教会法典宣誓之后,正式接受了昭通教区监牧之职,当时昭通新教区的教友总共4633人,有十个中国神父,陈达明主教到任后,因与当地神职人员意见不合,遂退职回四川,不久便因病去世了。

罗马教庭又重新委任了纪励志(Kerec)代理昭通教区的主教职务。纪励志是南斯拉夫人,慈幼会神父。他接任后不久,便向罗马教皇汇报了昭通教区的情况。后来,纪励志又请了一批意大利灵衣会神父来昭通,从南斯拉夫搬来一批方济各会修女,在昭通行医。

1936年,雍守正从比利时搬来方济各女修会,初到住在护国路,施药行医,后来迁移到兴仁街成立了圣母诊所和幼儿园。

前任主教金梦旦早想在昆明成立圣衣会的组织,然而始终没有办到。雍守正接任后才完成了这项志愿。1937年,雍

守正从越南请来一些圣衣会修女,在平政街(即今省红十字会医院后面)成立了圣衣会。这个修会是天主教苦修会中的一个派别,凡入会修女,一入会后就与世隔绝,永不出门,亲人来访,也只能在窗子外面,修女面上还蒙着一层黑布,只能听到她的声音,却看不到她的面容。比看望狱中的囚犯还要严得多,修女们唯一的工作,除吃饭、睡觉之外,整天就是念经、祈祷和手工刺绣等生计。

雍守正到任后还改革了中国贞女院和传教学堂。前任主教金梦旦所创办的中国贞女院是1923年成立的,由圣保禄会的两个修女负责管理。第一期招收学生23人,主要是学刺绣,也学一点中文,但是水平很低,毕业后分配到州、县,协助本堂神父传教,大多数只能教一点教会经文,每三年招一批,十多年来,毕业的学生还不到三十人。雍守正认为要使传教事业发展,必须使这些青年女教师受到更高的文化教育,因此,他创办了上智学校,他认为贞女院的学生必须中学毕业后,才有资格出去传教,至于传教学堂的学生,也同样必须取得中学毕业证书。这样,他们在政府方面才有资格当教员。所以,他把学生送到国立学校读书,一方面利用早晚课的时间向他们进行宗教教育。

1938年,雍守正命令圣保禄会修女接管了旧有的法国医院(即今华山西路的妇幼保健院),在里面安置了十五张病床,也成立了一个免费诊疗所。

雍守正从1933年底来昆明任职到1938年回国,为时不过四年,却创办了这么多的慈善、教育事业,又成立了这样多的组织,由于他过于劳累,得了心脏病,根据医生的判断,云南高原不适宜于他的病体,所以他不得不离职回国,罗马教庭也

知道他他对教会的贡献,遂提升他为驻印度尼西亚的教庭公使。

三、1939年,甘有为接任昆明教区主教,他于1914年就来到中国,在贵州省贵阳教区传教,1924年调回巴黎外方传教会任总务。

甘有为到任后,一切事务继雍守正的计划进行,没有什么新的发展,当时因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南京失守,于斌主教逃到昆明,创办了《益世报刊》,杨慕时神父任《益世报刊》经理,牛若望神父主笔和编辑,其他还有方豪、杨安然、董世让等人,都是于斌主教从外地请来的天主教神职人员。报馆地址在圆通寺对面,于斌在昆明也办了一个益世补习夜校,校长何子元,教员有杨安然、胡仲鸣、孙和平等人,科目分英、法文和理化、数学,教室借用上智男校的。于斌在昆明还成立了文化协进会和公教进行会,虚迪身教友任理事长,于天文神父任指导司铎,那时候从外地逃到昆明的天主教教徒越来越多,因此,昆明天主教堂当时的情况空前繁荣。

1941年,甘有为主教因病死于昆明,在出缺时间,由副主教何兴有代理昆明教区主教,教务事业没有什么新的发展。

1944年,罗马教庭委任了德为能为昆明教区主教,德为能在此之前是贵州省贵阳教区的传教神父。1924年来华,他接任以后,没有做出什么新的成绩,只是在1947年,他请了昭通教区的灵医会神父华德禄来昆明接管了昆明金马寺麻风病院,以前是昆明市政府委托基督教管理的。但过了一段时间,基督教也无能为力,又请天主教管理。

中国抗战胜利后,罗马教庭认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提高了,有必要把中国的传教区改为正式的主教区。1948年,成立了中华圣统制,昆明教区提升为云南总主教区,德为能升

任总主教。

四、1949年解放前夕,昆明大修道院院长兴文灏(法国人)率领全体大修道院学生逃往马来西来槟榔屿。

1950年,德为能下令解散了白龙潭女修道院,学生因此完全被遣散回家。

1951年,昆明市天主教界继四川之后掀起了三自革新运动,发表三自革新宣言。德为能企图破坏革新运动,妄用教会绝罚主权,停止了孔令忠神父的神权,不准他领导革新。又在太和街57号召开了全体神职人员会议,商讨如何对付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方法,中心问题是应不应该撤换太和街和华山东路的两位本堂神父,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中国神父坚持要撤换两位神父,最后推选孙和平神父为代表在人民政府所召集的座谈会上作了中心发言。

1951年9月9日,昆明市天主教三自革新会正式宣布成立,选出孙和平为主任委员,李岱学教友为副主任委员。

1952年,德为能和一批外国传教士被驱逐出境。

1958年,中国天主教选出新主教。于是,全国各地掀起了自选自圣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反帝爱国“三自”运动新高潮。昆明天主教教徒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通过教育和学习,把三自革新运动向前推进了一步。

1958年2月,以民主方式选出了孔令忠神父担任昆明总主教区的主教,孙和平神父被选为副主教。同年6月孔神父在贵阳领受了主教品,从此,云南的天主教教会摆脱了罗马教庭的控制,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

(本文作者系云南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干部)

(昆明市政协文史委供稿)

解放前昆明市第一个以宗教音乐 为主的合唱团——西南歌咏团

殷 波

昆明市西南歌咏团诞生于1941年。那时有许多联大和云大的同学,因为有着相同的音乐爱好,加之当时的昆明市在马思聪、黎国荃、金律声、周葆灵等音乐界著名人士及中华交响乐团先后抵昆献艺的影响下。因此,昆明的音乐气氛特别浓厚。那时,吴宝善先生及几位热心音乐的朋友合在一起,便产生了一个生气勃勃的音乐团体——西南歌咏团。这个团体的宗旨是提倡宗教音乐,服务社会。

当时正值飞虎队——美志愿空军来昆,西南歌咏团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的圣诞节初露头角,第一次的演唱大会演唱的就是《弥赛亚》。演出结束后,得到好评。接着,在昆明的各个盟军招待所纷纷来函邀请表演。他们的表演协助政府慰劳了这批远离家乡来华并肩作战的友人,得到盟军的称赞。因此,西南歌咏团这个音乐团体为昆明各界人士所熟悉。

西南歌咏团(以下简称“西南”)一方面做好慰劳陈纳德飞虎队盟友们的演出,另一方面也没有忘记穷苦的同胞。他们自成立以来,每年与本市基督教青年会合作举办冬季救济穷苦同胞的募捐音乐会(这是基督教青年会为了救济一些贫苦平民,使他们在饥寒的双重压迫下,能稍稍得着一点富人手中

的金钱援助,得以度过苦难的冬天则发起的冬赈募捐运动)。往年,昆明有的单位是以举办演京戏或放映电影的方式筹募救济平民的救济金。而1941年除上述活动外,增加了西南歌咏团的募捐音乐会。这类音乐会共举办了十余次,也算是他们对社会作出的一点贡献。虽然夸奖的人不少,而肯伸出援助之手使他们能够继续存在下去的老板和慈善家却寥若晨星。因为它是一个无丝毫背景的群众团体,它的成长,完全是靠自力更生,甚至练唱用的歌谱都是各个团员自己出钱买纸,自己刻腊纸,自己印出来的。有时濒于极端拮据的境地,但团员们有着共同的希望,兴趣和团结,终于把难关度过去了。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秋,抗战胜利后,联大北返,各位江浙籍的团员也纷纷返乡。“西南”便陷于停顿的状态中,“西南”的歌声也就听不到了。

解放前夕,1948年1月,云大基督徒团契的歌诗班,一方面感到这几年昆明市音乐界不如过去那么活跃,另一方面,也希望扩大他们的歌诗班。于是,有22个班友约同吴宝善先生齐赴大观楼里的鲁家花园开会商讨,经过讨论决议:正式成立一个宗教化的高级音乐团。它的名称对内是:“云南基督徒圣咏团”,对外是“西南歌咏团”,于是“西南”东山再起,正式恢复了。

自恢复以来,他们便起劲地练唱,练唱的地点是青云街竹安巷1号西南布道会,练唱时间是每个礼拜五的傍晚。到时,经过那里的人都会听到一片悠扬的歌声。庄严、静穆、圣洁的赞颂,使人们仿佛走进了修道院似的。他们的团员共有40多人,同心合力地在一个共同目标下,共同努力着。他们业余生活充满了圣洁的气氛。

1948年圣诞节来临之际,中华圣公会及“西南”联合举办圣诞节《弥赛亚》冬赈募捐音乐会。这是“西南”恢复后在昆明市的首次演出。时间是12月21、22日,地点在万钟街中华圣公会。

笔者于1943—1946年曾参加鼎新街基督青年会“海啸合唱团”,曾聆听过吴宝善及西南合唱团的演奏。本文根据回忆及当时报刊所载有者文章综合而成。如有遗误,请知情者指正。

(昆明市政协文史委供稿)

古幢与佛教

叶 铸

昆明市博物馆主体建筑“古幢厅”内的古经幢，称地藏寺经幢，在昆明地区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

古幢红砂石质，锥状体型，通高6.5米，七层八面，上布石刻造像300躯。属宋代大理国时期遗存的珍贵文物，1982年在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19年，古幢在昆明拓东路地藏寺旧址出土，即原地竖起，开辟古幢公园供百姓瞻仰。一段时间曾更名为儿童公园，后仍恢复叫古幢公园。“文革”期间，古幢公园内相继挤进一些工厂和住户，珍贵历史文物的安全，岌岌可危。八十年代初，昆明市人民政府耗巨资，陆续迁出园内的工厂及住户。在古幢获得妥当保护的基础上，着手在古幢公园原址筹建昆明市博物馆。1993年，博物馆建设工程奠基开工。1997年9月29日，昆明市博物馆落成并向观众开放。为有效保护古幢，并有利于群众观赏，专门为其建盖了气势恢宏的大厅，开辟成古幢展厅。

古经幢为龙纹须弥基座。第一层雕刻有汉文《造幢记》，称“大理国佛弟子议事布袁褒豆光敬造佛顶尊宝幢记。皇都大佛顶寺都知天下四部泉洞明儒释慈济师段进全述……”可知袁豆光造幢，系尊当年大理国通行的佛教教徒葬仪，为死者

高明生“圆功”，追荐亡魂，求得超度。死者高明生，系鄯阐侯高观音之子。高氏家族祖先高方素，与大理国开国君主段思平共同起兵，开国有功，获封鄯阐，任岳侯，子孙世宗。因此，高氏家族在大理国疆域内十分得势。宋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其成员高升泰曾一度即位做过大理国君主。宋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高升泰歿，其子高泰明尊父遗愿，复奉段裔段正淳为君主。高氏家族即世为相国。鄯阐即鄯阐府，大理国时期的昆明。早在唐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南诏国国君阁罗凤巡视昆明（昆明地区），称赞道：“山河可以作藩屏，川陆可以养人民”，是筑城定都的好地方。于是，命其长子凤伽异于唐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在昆明筑拓东城。开创在昆明城现址上筑城之先河。

古幢第一层与基座间，除刻有《造幢记》外，还刻有《佛说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大日尊发愿》、《发四宏誓愿》。全是佛教经文。

古幢第一级，以古藏文（一说梵文）阴刻《尊胜陀罗尼经》。其间，雕有持国、增长、广目、多闻四大护法天王，脚踩六个夜叉。幢体第二级四面设龕，雕有大日尊说法、金刚、菩萨、天王等。幢体第三级也四面设龕，雕有菩萨、供养、金刚、天王、善财、龙女、飞天等。第四级雕有佛像、护神武士、天王、菩萨、和尚、天女、飞天等。第五级雕四只大鹏金翅鸟。第六级雕四座庑殿以及如来佛像、侍者。第七级雕有佛母、天王、胁侍。最上雕莲座承托宝珠，是为经幢宝顶。

可见，整座古幢的造像，全是佛教教义中的神像。

300躯造像，大者高约一米，小者不足3厘米，刀法细腻，生动传神。佛龕庑殿，梁柱分明，瓦檐斗拱精致，匠心独到。

焰纹背光,卷云宝盖,基座龙饰,宝顶莲座,无不沁透出智慧与功力,昭示着博大精深的艺术创作灵性。

古幢造形宏伟而造诣精美,成为我国佛教石刻艺术遗存中的珍贵文物。在有关资料记载的明代以前全国的600多座石幢中,论造像之多,造型之精美,内容之丰富,当首推昆明市博物馆内的古经幢了。为此,该古幢被誉为“滇中艺术之极品”,“东方佛教绝世稀有之美术。”(“中国城市”编辑部《当代中国城市·昆明》。)

大理国段氏主国的300余年间,共22位君主(高氏契入的两年除外)。其中,有7名是在位一段时间后,即“禅位为僧”或“避位为僧”。退王位为僧者占到三分之一,大理国王室信奉佛教的程度,足见一斑。对大理国开国君主段思平,也有“帝好佛,岁岁造寺,铸佛万尊”的记载。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大理遣使入宋,“求经书六十九种……”(《南诏野史》。)这一切再次证明,大理国国君笃信佛教。“君之所好,民乃趋之若骛也。”因此,说佛教是大理国国教,一点不过。说古幢是佛教艺术之极品,当之无愧。(云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南诏大理文物》。)

至于古幢造像的佛教教派归属,王海涛先生说:“神像纵向排列是按须弥山规制层层上升,由大海到天宫;横向排列是按密教金剛界四门曼陀罗法设坛。总言之,昆明古幢实为一尊密教立体曼陀罗(神坛)。造像虽然有的受《仪轨经》束缚,有的受内地圆教影响,如地藏,但更多的是具有云南自有的特点,如天王戴耳环、穿芒鞋,地位最尊的佛母等等。”(王海涛《昆明文物古迹》。)这番论述,有理有据,应该令人信服。为此,古幢造像的主流,非云南特色的佛教密宗莫属了。

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拓东路拓宽改造工程施工中,又在原地藏寺旧址上出土一只石幢。出土位置在古幢北略靠东向,距古幢仅50米许。石幢砂石质,八面,高75厘米,底径25厘米。铭文阴刻有汉字《张氏尊胜宝幢记》,共19行每行24字。文字内容仍为仰颂佛法,追荐亡灵。并称“雕菩萨之形象,横刻尊胜梵字……伏望赖()佛母之威力,仗密咒而扶持……”另,幢体上也刻有梵文。款识年代为“至正己丑孟夏吉日”,可知是元代的石幢。(胡绍锦《考古手记》。)无独有偶,这一大一小两个石幢,皆如出一辙;一宋一元两个朝代,都隍依佛门。当然,大幢的声威,小幢实在是望尘莫及的。

(昆明市政协文史学习委供稿)

(作者系昆明市博物馆馆长)

记昆明居士林

艾 奇

位于昆明螺峰街桂花巷的居士林,是在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光辉照耀下、市人民政府批准对外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

居士,指在家奉佛的信徒;“林”可引申为聚集、聚会的所在。昆明居士林筹建于1986年,由市佛教协会副会长简惠英主持工作。1988年经市民族宗教事务处批准,正式成立。十年间,团结了数以千计的佛教信徒,开展佛事例会、研究佛经、弘扬佛法等活动,声名远播国内外,在昆明佛教史上,写下了不可或缺的一页。

记述昆明居士林的建立和发展,首先不得不简略回溯一下它的历史渊源。

1920年年底,驻川滇军不愿介入内战,撤离四川。第一军长顾品珍身患重病,由部属昇送起程。途次黔北,驻于当地何姓大宅内。何家有女,年纪不足二十,因仰慕在川南内江至资阳一崇颇有政声的顾军长,执意委身相从。几经展转,终于如愿以偿。她亲待汤药,使得长年只身在川的顾氏,尝到了家庭生活的温暖。

顾品珍病愈后,统率一二两军(第二军长赵又新前已在川阵亡)余部回滇。联军总司令唐继尧特任之为东防督办,驻扎昭通,整训部队。当时,云南因连年用兵,省库空虚,非亲信队

伍经常拖欠饷项,激起军内官兵的不满。1921年1月下旬,顾品珍顺应多数中级军官的请求,毅然挥戈南下,何氏自然同行。

顾部日益逼近昆明,驻扎寻甸的靖国第八军长叶荃倒戈响应。2月7日,唐继尧被迫宣布“解职”,出走越南。两天后,顾品珍率师进入昆明,被推举为滇军总司令。三个月后,因原代理省长周钟岳坚决辞职,顾氏兼摄省长。

何夫人年事较轻,谦恭勤谨,获得原配张夫人的怜爱,处处关照,共住一宅,和睦相处。

1921年11月,顾品珍奉孙中山命,积极组军北伐。次年3月,唐继尧带领驻桂滇军,攻入滇东南,且收买滇中土匪,作为内应。顾氏率师防堵。因援军不到,陷入匪部重围。3月26日,弹尽粮绝。顾氏与参谋长姜梅龄,在路南宜良间的鹅毛寨地方,自杀而亡,唐部兼程疾进,两天后到达昆明,重掌云南军政大权。

骤然的变故,使何氏痛不欲生,要求从此长斋念佛。张氏多次相劝,何氏竟“割乳献佛”,以示志不可夺。张氏只得拨给东大街(今长春路)房产一处,并请亲族中一张姓妇女相伴,陪何氏闭门修行。

1931年5月,云南居士林成立于昆明石桥铺,不少学者名流,如昆明宿儒陈荣昌、顾视高和唐政府的财政司长王九龄、内务司长吴琨等人,都参加了活动。作为滇军总司令兼云南省长遗孀的何氏,也应邀到石桥铺参加过佛会。云南居士林礼佛拜佛、研究佛学、讲经说法的种种活动,都给她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许多个年头就在闭门修行、诵经礼佛中过去了。解放前

夕，顾品珍旧部夏某的遗孀前来探视。此人同样看破红尘，削发为尼，法名湛怡，独个人居住在自己购买的桂花巷的一幢陈旧的房屋中，布置佛堂，僧装修行。两人相谈之下，何氏为湛怡的削发行为深表赞赏，坚决拜湛怡为师。暂时仍在家静修。到解放后的50年代初，何氏无牵无挂，孑然一身，投奔桂花巷，和湛怡同住。

1957年，何氏在华亭寺名僧修圆主持下，正式受戒为尼，法名寂圆。从此，师徒俩在桂花巷中，潜心礼佛，形影不离。生活来源，依靠前来拜佛的信徒们介绍做针线活计的劳动收入维持，一度曾代人白天带领孩子。还把两间空闲的房间租给女居士居住，以租金添补生活。

“文革”中，红卫兵也曾冲击到桂花巷。虽然找不到什么“政治问题”，但还是命令湛怡师徒，脱下袈裟，换上俗装，收起佛堂。湛怡不久仙逝，寂圆此后就独自一人修行了。

1981年，中共宗教政策落实，昆明市佛教协会再度建立，寂圆当选为协会理事，和同任理事的简惠英相遇。

简惠英自幼即信仰佛教。1929年6月，她才10岁时，随姨妈游华亭寺，即接受“皈依戒”（戒师为即将离滇的虚云和尚）。中学毕业后，长期从事财经工作。解放后任文化用品公司门市金马片区主任，同时又是民建成员。1979年退休后，宗教事务处处长楚勇，请她管理原市佛协的房产。1981年市佛协再度建立，被选为理事，担任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她的丈夫于乃义，别署归净居士，为云南知名文献学家，对佛学有着精深造诣。简惠英对佛学的理解，得力于丈夫的帮助和指授。1980年12月乃义病故，遗命她以余生献身佛教事业。停灵才盛巷寓所期间，寂圆曾亲率徒众10人，在灵前诵经一昼

夜。为表示继承亡夫遗志，虔诚礼佛，简氏后来曾到江西名山云居山真如寺中受居士戒，戒师赐法名为宽惠。

寂圆寿登耄耋，自知来日无多，多次和简惠英提起，身后把桂花巷房地献给协会，开办类似早年云南居士林的组织，为居士们提供活动场地。在一次理事会上，把房地契献给协会。

1984年，圆寂病故。两年后，简惠英受市宗教处和市佛协委托，着手筹组昆明居士林。她为人精明干练，对此作出通盘考虑，细致擘画，每天不惮劳累，四出奔跑。初步决定，在桂花巷建造殿堂，供居士们礼佛拜佛。

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使得一切爱国教派获得欣欣向荣，不断发展，加上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不断腾飞，群众收入逐年增加。人民物质生活提高后，理所当然地开始要求丰富精神生活。筹建居士林的消息外传后，许多佛教信徒热情主动地积极参与，找“简居士”为之出谋划策，或到设于圆通寺（按该寺当时归市佛协管理）大门内的筹备处捐挂功德。昆明居士林一开始便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上级领导的关怀支持下，在众多居士群众的积极协助下，简惠英从人们文化层次有深有浅的客观事实出发，决定把居士林办成宜雅宜俗的居士聚会地。首先确定，昆明居士林主要供奉在群众中有广泛影响的观音菩萨，以观音殿为基础，同时辟出安静的宿舍，提供知识阶层的居士林研究佛经、佛学。

昆明居士林终于破土动工，1988年12月全部建成。主体建筑为一大间观音殿，殿对面为两层楼房，楼下设办公室和寂圆纪念室，楼上为佛堂和小会议室。

简惠英为建林而呕心沥血。房建过程中，曾致函北京居

士林了解情况，对方很快就寄来了简章和有关文件。华亭寺的一座多臂观音铜像，原已残破，移来市区，经修整涂金后，供奉在观音殿正中。乘出差之便，简氏还赴天台山，委托巧手工匠，用檀木雕成文殊、普贤座像，经贴金后作为胁侍，供奉于观音左右；又从杭州征集得十六尊者壁画，立于正殿两壁。德和罐头厂和昆明卷烟厂信徒献给市佛协的、摹刻唐代名画家吴道子所绘观音大士的石碑，则立于殿外，供人瞻仰。

1989年1月13日（农历十二月初六），昆明居士林观音法像“开光”，正式接待信徒。众多居士争先恐后地拥向居士林。九十年代初，登记在册的居士即达3000人之多。

居士林香火逐日旺盛。中共市委统战部 and 宗教局的有关领导，不只一次前往视察，对工作继续给予关怀和支持。简惠英本人深受鼓舞。她想起乃义生前经常对她叹息滇中“禅讲”（讲经说法）不继，认为：居士林的活动，如果仅只局限于礼拜菩萨，照本宣科地焚香念经，那对于佛家哲理的探索、佛经的升华以至佛教的发展，好处是不大的。因此，她殚思极虑地开展佛学研究。在亡夫友好张一鸣等人协助下，先后开办了学经班和佛学研究会。昆明居士林从而超越过世俗拜佛的范围，成为同时具有研究佛经、弘扬佛法意义的群众宗教团体，在省内外独树一帜。

国内外宗教界人士不断慕名前来访问，上海著名的真禅法师，赞誉昆明居士林学术风气浓厚；台北居士先后来访7次，仅《南海》杂志社社长高仰崇，便来过两次。晋籍一位老居士，年轻时服役离省，大陆解放前展转去到台北，现退役在家，儿孙满堂。参观过居士林后，曾从台湾捐资赠书，祝愿它不断各向前发展。新加坡一位和尚、四位居士，先后5次到

昆明居士林；日本岗山正通寺住持稻谷祐宣等三位禅师，对居士林办得成功表示赞赏，还在“林”中和简惠英及工作人员，共进素斋两次……

昆明居士林现有定期举行的三大宗教活动：

一、佛会。农历每月初一和十五举行。居士们及期前来，烧香拜佛。由于地点拥挤，自然形成此来彼去的“流水”形成。“林”中备有素餐，拜佛者可以就地吃斋。每月两次的佛会参加者，且有逐月增多的趋势（按在册居士，现已超过4000人）。

观音殿中焚香拜佛的同时，楼上佛堂进行“拜普佛”。在钟鼓木鱼交作声中，居士们伴随“法器”，整齐划一地诵经，或诵《楞严咒》。诵经的声音通过录音机和话筒，清楚地传到殿内。

二、讲经班。每周两次，由对佛经研究有素者主讲。目前，讲经班学员已有192人，分为10组，多为离退休老人。已先后讲过《大乘无量寿经》、《楞严经·普贤行愿品》。限于地点窄小，主讲者在楼上对话筒宣讲，学员在楼上楼下汇集，通过“电传”听经。

三、佛学研究会，每月一次。由研究佛学有心得者专题发言，讲完开展讨论，或针对讲稿提出质疑，并开展辩论。从1989年6月到1997年年底，已先后开展过《法界缘起——佛教世界观》、《禅宗与禅学浅谈》等多个专题，9年间举办过87次。

另外，昆明居士林还决定编写《昆明佛教史》。九十年代初，在市宗教局支持和同意下，简惠英即开始策划，组成了写作班子，全书提纲已由担任该书主编的张一鸣拟就，通过讨论，决定了分工。后来由于编纂诸人其他工作繁忙，工作停